

感謝苦難

函授

彦

[illegible]

孙志远
●
著



当代艺术家传记

感謝善維

函授

参



孙志远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K825.72
S2x/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谢苦难:彦涵传/孙志远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5

(当代艺术家传记)

ISBN 7-02-002408-4

I. 感… II. 孙… III. 彦涵-传记 IV. 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9124 号

责任编辑:龚 玉 李 昕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7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25 插页 8

1997年5月北京第1版

199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4.00 元

序

管桦

我和彦涵是老朋友。说起他这一辈子，真可谓历尽坎坷、饱经磨难，并且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出身贫寒，性格刚直，一生都不曾平静过。中学时，他因反对教育当局不合理的规章而被学校开除，后在亲友资助下才得以进入国立杭州艺专。他本想静心学画，将来当一名乡村美术教师，可是抗战爆发，为宣传抗战，他两次领导学生闹学潮，而后又放弃了上大学和出国深造的机会，奔赴延安，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艺术生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他一手拿枪一手握笔，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反映人民革命战争和土改运动的木刻作品，是一位勇敢而优秀的人民画家。解放后，由于他的仗义直言，一个又一个灾难降临到他头上，他被打入社会底层，但是他从来没有消沉过，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顽强地与命运进行抗争。在长达二十一年的逆境中，他一面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一面手握刀笔默默耕耘，被人称为“趴在地上战斗的战士”。最为令人钦佩的是，在冤案平反之后，艺术上早已功成名就的他仍然永不停息地奋进，大胆地超越自我，变革画风，开始了“衰年变法”，在艺术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由此可见，彦涵的一生是很不平凡的。谁都明白，世界上有种种人生，而不同的人生有“含金量”高低之不同。在我看来，即便是做了社会名流的人，也未必每个人都生活得那样充实，那样

2005/69

积极,那样富有价值,因为在社会上日益汹涌的追名逐利的浪潮下,那些随波逐流者虽然把自己包裹在浮华的装饰之中,却很难说是真正活出了什么意义。所以我一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名人都配得上一本关于他(她)本人的名人传记的,但彦涵却无疑属于那种值得传记作家大书特书的人。这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对于这部传记作品而言,彦涵的经历坎坷、一波三折、引人入胜,这很重要,但并不是关键因素;彦涵的艺术造诣精深、成就超群、硕果累累,这也很重要,但仍不是决定一部传记的题材可否成立的根本内因。我以为,这本书之所以值得写因而也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是因为作者发现并展示了彦涵这位当代著名艺术家的高尚人格和艺术情操,是因为书中的故事时时刻刻都在显示着彦涵的一种令人尊敬、令人感佩的无私无畏的精神,以及不屈不挠地追求真理、孜孜不倦地追求艺术的完美境界的精神。说得具体一点,这种精神就像彦涵创作的那幅惊世骇俗的作品《探日》所表现的那样,彦涵本人就像那位前往太空探日的勇士,为了追求太阳的光和热,哪怕被烈日灼伤甚至焚毁也在所不惜。这种大气磅礴、大义凛然的献身精神,难道不正是激励着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并始终不渝的信念吗?因此我要说,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精神作为内在的支柱,这本书才具备了思想的力度和容量:它实际上是以一位艺术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心路历程,相当深刻、相当准确地概括出了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用彦涵一个人的具体的生活故事,折射出中国社会的一部风云变幻的当代史。

从文风上看,这本传记写得相当朴素,相当平易近人。作者不像时下一些摆花架子的作家那样喜欢玩弄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而是本本分分,扎扎实实,不雕琢,不卖弄,不搞哗众取宠。他总是力求客观,力求如实地记述彦涵的经历,严格地走现实主

义创作的路子。听彦涵说,本书的作者与他是忘年交,两人相知甚深,而作者花在这本书上的时间,累计起来大概也有六七年之久。为著其传而先知其人,这是非常必要的,到底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本书的分量明眼人一望而知,是不需要多说的。尽管它看起来似乎不那么时髦,不那么“现代”,但是作品中洋溢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却是扑面而来、感人至深的。许多细节具有催人泪下、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许多画面生动逼真,连缀起来,那便是一幅浓墨重彩的当代社会生活画卷。我想,这才是作品真正的艺术价值之所在。所以我很欣赏这句话:真正的技巧在于不去专门地使用技巧。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道理。我觉得,这本书便是以相当朴拙的形式创作出的一部具有相当艺术水准的作品,它同时也证明了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是永存的。

最后我想谈谈它的书名。本书名为《感谢苦难》,初初一听有些费解,但细细想来,又以为它别有意味,似乎包括着某种哲理。人所共知,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恐怕很少有人会甘心情愿地忍受苦难的。但是,人们为了追求幸福,却往往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苦难,不管他情愿不情愿。于是,在现实里,苦难总是在摧残和毁灭着人,也总是在造就和磨练着人。被苦难摧残和毁灭的人将会诅咒它,被苦难造就和磨练的人将会感谢它。伟大在于不幸。

我想,感谢苦难的人注定属于生活的强者。

1996年11月

目 录

第 一 章	渔网骤然而落	1
第 二 章	画的梦想	45
第 三 章	人生抉择	94
第 四 章	到前方去	133
第 五 章	太行山上	154
第 六 章	淬过火的刻刀	207
第 七 章	向封建堡垒进军	254
第 八 章	风雪中的落叶	294
第 九 章	扼住命运的咽喉	347
第 十 章	月亮悄悄走过	374
第十一章	探日	409
第十二章	春潮	455
第十三章	衰年变法	480
结 尾	感谢苦难	506

第一章

渔网骤然而落

1

北京的春天总是来去匆匆。路边的小草刚刚拱出解冻的地面，河边的柳树刚刚舒展一下僵直的腰身，公园里各种各样的小花还没来得及绽开它们美丽的花瓣，一场持续而猛烈的风沙刮过，酷热的夏季便骤然而至。

比起往年，1957年的春天似乎完结得还要早些。刚进6月，天气就开始燥热，到了中旬，即便是上午，也已经热得让人有点烦躁不安了。

彦涵没有感到天气的炎热。在去文化部礼堂开会的路上，他一边轻快地蹬着自行车，一边情不自禁地哼着京戏，嘴里还不时地打着锣鼓家伙，弄得行人直回头看他。

他今天特别高兴。昨天，他终于把《八路军东渡黄河》画完了，那是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委托他画的一幅大型油画。效果不错，别人看了都有些吃惊，说，想不到你这个大名鼎鼎的版画家油画也画得这么棒。他自己也很满意。如此一来，过几天，他就可以打点行装，去南方体验生活、收集素材了。

这是他年初就订好了的计划。他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建设工地上去……总之，到火热的生活当中去，就像当年去前线、搞土改一样。他喜欢热火朝天的生活，那里有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让你激动，让你振奋，给你激情，给你灵感。他要用他的

画笔和刻刀，尽情地去描绘这美丽的生活。而且，一定要在艺术上有所创新。过去，整天行军打仗，动荡不安，作品虽然搞了不少，但总是太匆忙，未免有些粗糙；解放后，整天在美院里教书，画画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出去体验生活的机会也少，这真让人有点苦恼。现在好了，他是美协的专业画家，生活安定，时间充裕，行走自由……这么好的创作条件，不正是他多年来的梦想吗？而且，他刚四十一岁，正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要努力，一定要努力！不能因为过去搞了一些好作品，别人一捧，就自满自足，更不能因为条件好了，变得懒惰。下去，尽快下去！作为一名“三八式”的老党员，一名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画家，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才是！

他兴冲冲地走进了文化部礼堂。

大会已经开始，礼堂里黑压压坐满了人，台上的人正在讲话。他悄悄穿过过道，在后面找位置。

气氛好像有些不对。参加会的都是首都文艺界的人，文学界的、美术界的、戏剧界的、电影界的……不少人彦涵都认识。平时大家各忙各的，难得见面，见了面总是有说有笑很亲热，即使像眼前这种情况——会议已经开始，不便讲话，也会用目光或手势互相打个招呼。今天却有些异样——没有一个人和他打招呼，人人都板着脸，毫无表情。整个会场的气氛也变得沉闷紧张，完全没有了以往的热烈与轻松。

这是怎么了？到底开什么会呀，气氛弄得这么紧张？

他坐下之后，抬起头，猛然看见会场上的大幅横标，上面赫然写着：文化部开展反右斗争群众动员大会！字很大，有棱有角，高高地、冷冷地注视着会场的每一个人。

他心里不由一缩，又要搞运动了！

他对运动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解放没几年，运动一个接一

个,而且总是反这反那,三反、五反、镇反、肃反……每次运动都要整一批人,都有人跳楼投河抹脖子上吊,弄得人人自危,战战兢兢,互相提防。

“别以为经过几次运动,我们的队伍就清理干净了,天下就太平了,不!树欲静而风不止,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已经向我们的党发动进攻了!”

台上,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正在作报告,声音里带着无比的愤怒,震得麦克风嗡嗡作响。

“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利用我们党的民主整风,大肆鼓吹所谓的大鸣、大放、大民主,上窜下跳,到处煽风点火,呼风唤雨,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是一群隐藏得很深的阶级异己分子,在我们文艺界里,就大有人在!现在,他们已经露出了狐狸尾巴,被我们牢牢揪住了!”

一些人被点了名字。几乎全是文艺界泰斗式的人物:艾青、丁玲、冯雪峰、钟惦棐……陈克寒声色俱厉,嗡嗡震耳。

台下静得可怕,人人都神色紧张,大气儿不敢出,连手中的扇子也不敢使劲扇,任凭脸上冒汗珠儿。

每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彦涵心里就咯噔一下。天哪,他们都是老革命、老延安,都是才华横溢、颇有成就的文艺界栋梁之材,怎么忽然都成了反党分子?

忽然,他听到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名字:江丰!

“江丰在鸣放期间,利用党的整风运动,纠集了一批骨干力量,组织了反党集团!”

彦涵惊愕得呆住了。美术界里从延安来的老同志谁不了解江丰?这位三十年代的左翼木刻家,坐过国民党的监狱,1937年到延安,从鲁艺的美术系主任到中央美院的院长、党委书记,二十多年来,可以说是对党忠心耿耿,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党

的美术教育事业。他会反党？还组织了反党集团？这怎么可能呢？！

还没容他细想，只听陈克寒又高声说道：

“在江丰反党集团里，有个得力的干将，他就是彦涵！”

就像头上冷不丁地重重挨了一闷棍，彦涵顿时目瞪口呆！

我？！是讲我吗？彦涵几乎怀疑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周围射来各种各样的目光：吃惊的，愤怒的，冰冷的，幸灾乐祸的，也不乏同情的，惶恐不安的……

彦涵全然没有感觉到。他懵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他脑子里像飞进了无数只黄蜂，嗡嗡直响，乱作一团。我反党？我怎么会反党呢？我又什么时候加入反党集团？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陈克寒后面又讲了些什么，他根本没听进去……

一切似乎是从5月22日那天晚上开始的。

不，应该再提前两个月，是从春天开始的。

1957年的春天是多么美好啊，当冰雪消融、杨柳吐绿的时候，令人振奋的事情接踵而来：刚刚传达了毛泽东3月12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接着《人民日报》4月11日发表了《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然后又在5月1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这些代表着共和国最高领导层的声音，犹如缕缕和煦的春风，使得风沙扑面的北京变得春光明媚，也使满怀爱国之心的知识分子们无不为之欢呼雀跃。

接着，整风开始了。

整风开始的时候，彦涵没有参加。他正忙着画《八路军东渡黄河》。因为家里地方小，画不开，军事博物馆替他在解放军画

报社找了间屋子，他每天就蹬着自行车早出晚归地去那里画画。但他关心这场运动，每天不管回到家里多晚多累，也要找出当天的报纸浏览一遍。他对这场运动中的良好的民主空气感到由衷的欢欣鼓舞；同时，对鸣放中的一些言论，诸如“今不如昔”、“轮流坐庄”也十分愤慨——这是污蔑社会主义，妄图取消党的领导嘛。

5月22日那天晚上，他被邀请参加了一个座谈会。是油画班结业的座谈会——1955年，文化部请来了苏联的马克西莫夫教授，在中央美院办了个在职干部油画进修班，现在结业了，大家自发地开了个会，座谈今后的创作打算。

他本来不想去——画了一天画，很累，想早点休息，明天一早接着画。

他也完全可以不去——那个会跟他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他还是去了——为了支持那些同志的创作。

参加会的大都是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同志（其实也就四十出头，但参加革命时间较长，所以都这么叫），过去由于条件所限，没能好好画画，现在生活安定了，想静下心来搞些作品。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提出以后，大家更是热情高涨。眼下正提倡画革命历史画，这些老同志经历丰富，思想成熟，现在又经过两年的专业进修，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自然想在这方面做出成绩。但是他们大部分不是专职画家，创作时间难以保证，所以很希望文化部能成立个美术创作室，把大家集中起来，专心搞创作。会上，大家推选出两个代表小组，分别到中宣部和文化部去反映这一要求。一个由古元带领去中宣部，一个由彦涵带领去文化部。因为他俩名气大，说话有分量。

按理说，成立创作室也和彦涵没什么关系，他本来就是美协的专职画家，成立不成立他都照样搞创作。但他理解这些老同

志的苦衷,乐于为促成这件事而奔走。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早饭都没顾上吃,他便和中央美院油画系主任冯法祀等人早早到了文化部,想在一上班的时候见到部领导。结果在收发室里等了好长时间也没见到。后来,夏衍副部长把电话打到收发室,冯法祀便在电话里把大家的要求简单地汇报了一下。

夏衍说:“这样吧,你们先回去,过一会我们到美院去,召集大家开个座谈会,你们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可以在会上提。”

冯法祀放下电话,高兴得不得了:

“赶快回美院,把昨天开会的人都召集来,夏部长他们要到美院开座谈会,详细听取大家的意见!”

大家非常兴奋,说,看来事情有门啦!又呼呼啦啦赶回美院。

当天上午,昨晚开会的人又集中在美院 U 字楼的一间大教室里,等待部领导的到来。

没一会儿,部领导来了。不是夏衍,来的是另外一位副部长——刘芝明。还有中宣部文化处处长苏一萍。当他们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刘芝明和苏一萍满面笑容,向大家招手点头,十分亲切。

坐下以后,刘芝明说:“夏副部长和中宣部领导通过话了,他们今天有事来不了,我和苏一萍同志代表文化部和中宣部来参加你们的会。”

大家热烈鼓掌。上级领导如此重视大家的要求,真是让人感动。

刘芝明说:“听说大家有些意见和要求,这很好嘛,帮助领导改进工作嘛。你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尽管讲,畅所欲言,什么都可以讲!”

于是大家热烈发言,又把昨晚在会上说过的话说了一遍,还

提出希望领导能批给一块地皮，拨一笔资金，盖一座画室，大家好有个地方画画。

彦涵也发了言，说成立创作室对繁荣创作如何如何的有利，鼓动领导批准。

其实，大家并没有领会领导真正的意思。

大家发言之后，刘芝明表态说：“大家的要求很好，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请大家放心。”

大家深为感动，又是一通鼓掌。看来成立创作室的事没问题了。

“别的还有什么意见哪？”刘芝明问道。

大家依然没领会领导的意思，笑着说，我们就这个要求，别的就没什么意见了。

“还有什么意见，尽管讲嘛！现在是帮助党整风嘛，大鸣大放嘛，有什么意见就讲嘛！”

开会的人面面相觑，一时没有转过弯。大家只希望能成立个创作室，并未想谈什么意见。会场沉默下来了。

“讲嘛，对领导有什么意见就大胆地讲嘛。”刘芝明再三动员，“毛主席说了嘛，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不许扣帽子，不许打棍子嘛。大家不要有顾虑，有意见尽管讲，什么都可以讲！党员带头讲！”

会场沉默好久，才开始有人发言，给领导提意见。

至此，成立创作室的座谈会变成了整风座谈会。

一开就连着开了三天。

这三天里，会议范围不断扩大，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初是油画进修班的人，后来中央美院、中国美协以及在京的美术单位，都有不少人参加。人数由最初的三十多人扩大到七八十人，最后一天达二百多人。

意见也越来越深入、尖锐。头一天,主要对中国美协领导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领导提了一些批评意见,都是关于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的一般性意见。到了后来两天,意见便集中在了江丰的问题上。不是批评江丰,而是为江丰抱打不平。

作为美术教育家,江丰积极主张,在美术教学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绘画基本功,要求学生画好素描,尤其是人物素描,以便更好地表现现实生活,塑造新时代的人物形象。他认为在新的生活面前,中国传统绘画显得内容陈旧,缺乏时代气息,因此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要发展传统,改革中国传统绘画,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而美术界另外一些同志不赞成他的主张,特别是某些国画家。

这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之争,却被某些领导引向了别处。

早在去年,美术界某些领导就到处散布“江丰排斥中国画”和“江丰要消灭中国画”的观点。文化部钱俊瑞副部长也多次在公众场合批评指责江丰“排斥中国传统绘画”,给江丰定下了调子。

更离谱的是,去年中央提出要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之后,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位领导竟在会上说:“现在,美术界里有股暗流,以学术讨论面目出现,反对党的政策。”还有人说:“美术界的这股暗流,不管动机如何,性质是反党的。”把学术问题一下子扯到了政治问题上。

整风开始,江丰被报纸点了名。《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都发表了批评文章,批评他在教学指导思想上搞民族虚无主义,重视西洋画,排斥中国画,意在消灭中国画。又说他歧视、打击国画家,对一些国画家不予安排工作,致使他们陷于生活困境,等等。其中一篇题为《一个老画家的遭遇》的文章,以中央美院

国画家李苦禅先生为例,说有段时间,李先生的每月工资只有八元钱,生活难以为继。

这些文章一出来,立刻在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不了解江丰的人表示愤慨;了解江丰的人更是愤慨。

参加座谈会的大都是美术界知名人士,对江丰比较了解,对领导上批评江丰的一些说法早有看法。《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恰好是在开会的那几天登出来的,大家看了群情激愤。既然领导一再号召大家讲话,而且要大胆地讲,什么都可以讲,那就讲!于是争先恐后,为江丰大鸣不平。

许多人发言说,江丰在战争年代里因环境条件所限,对中国画接触不多,对其认识不足,确有重视不够的一面,但随着学识的提高,其重视程度也在不断加强;江丰主张注重绘画基本功,主张改革中国画,都是为了更好地反映新时代的生活,根本谈不上什么要消灭中国画,更谈不上什么反党;至于对一些国画家的工作安排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社会问题,不是中央美院自身所能解决得了的。解放初期,很多国画家没有工作,文化部将其中一些人安排到美院,美院出于统战政策考虑,全都照收了,但美院只有一个国画系,没有那么多课时,有些人排不上课,加上江丰在工作方法上存在着一些缺点,一些国画家难免对他有些意见。但这绝不等于江丰歧视、排斥和打击国画家。

发言的人都很激动。中央美院副院长吴作人,说着说着站起来,气愤地说:

“《人民日报》的文章与事实有如此大的出入,在群众中引起了不良影响,我感到非常痛心!我要求《人民日报》予以纠正,消除影响。在座的华君武同志,你是《人民日报》的,请你转达我的意见。”

许多人在发言中还对美协和文化部的个别领导提出批评,

说美协一些领导对江丰的指责攻击，很大成分是出于个人恩怨，是宗派主义在作怪，严重影响了美术界的团结；而钱副部长听信了美协个别领导的观点，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彦涵和大家的看法是一样的。但是头两天，他没怎么发言。他的心思还在那幅未完成的《八路军东渡黄河》上，满脑子都是黄河滚滚咆哮的波涛、颠簸摇晃的木船、击风搏浪的抗战将士……

直到座谈会的第三天下午，他才发言，而且几乎是最后一个。

也许就是那番发言出了问题？

彦涵苦苦回想着。

那次座谈会上，彦涵原先并不打算发言。

座谈会开到第二天中午快散会的时候，刘芝明对大家说：

“这两天的发言很好，非常好，这就是帮助党整风嘛。还有许多同志没有发言，还有许多意见没有讲，不要紧，这个会不算完，明天还要接着开，而且范围要扩大，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参加。我希望我们的老同志，尤其是老党员，要带头发言，不要群众都讲了，我们的老党员还袖手旁观，做了群众的尾巴。这也是考验每个党员党性的时候嘛。”

这几句话让彦涵改变了主意。

是啊，自己是老同志、老党员，不发言确实说不过去。况且，领导这次是真心实意地要好好听取群众的意见了。应该讲讲，明天就讲。

讲什么呢？他一时还没想好。

散会后，他约上王琦，一起到和平餐厅去吃午饭。王琦是版画系的教授，两人是同事，也是朋友。